

“宾主交欢席，威仪在一壶”*

中国古代投壶的东传及其在朝鲜半岛**的流变

徐 成***

■ 摘 要 ■

投壶是极具有儒家色彩的礼仪，游戏性极强，具有乐嘉宾、正心术的妙用。由先秦迄清，仪节虽有变化阙失，然总体上绵传未绝。投壶在南北朝时期传入朝鲜半岛后，时值半岛三国时代，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皆乐于此道，后来在高丽时期投壶之法又传承渐稀，到了以程朱理学立国、重视儒家礼仪的朝鲜王朝，对于投壶较前重视，投壶之道又藉此大兴，并发生了本土化的变革。中国的投壶自两晋南北朝时代传入朝鲜半岛后，其流也远，其泽亦广，在传承着中原投壶之神髓的同时，也相应因地制宜，生发出自己的特色。

[关键词] 投壶；朝鲜半岛；同异；流变

— 목 차 —

- | | |
|----------------|-----------------|
| I. 緒 論 | IV. 投壶在朝鲜的流变与盛行 |
| II. 中国投壶的滥觞与变化 | V. 余 论 |
| III. 中国古代投壶的东传 | |

I. 緒 論

朝鲜半岛古代之礼学，大家迭出，金长生、黄景源诸人皆领一代治礼之风；其于礼制，著作蕃盛，有《国朝五礼仪》之流亚行于世。¹⁾ 中国学界对于朝鲜礼学之研究，大方面已有不少高著雄文，但于一些

* [朝鲜] 柳台佐：《鹤栖先生文集》卷一《诗·投壶》，韩国国学振兴院藏岭南士林文集本，第4页b。

** 本文的时段主要侧重近代以前的朝鲜半岛，确切而言是日本殖民期(韩语：일제강점기/日帝强佔期)以前的朝鲜半岛。

***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硕士研究生 / thomasxc@foxmail.com

1) 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经史篇·家礼辨证说》：“我东则儒贤之学，或以性理为主而专事者，或以礼说为务者。而经学则又不如礼学之笃，故礼书最多。如高丽毅宗命崔允仪等着《古今详定礼仪》五十卷，高丽柳陞撰《新仪》。入于国朝，英庙命集贤殿儒臣撰《国朝五礼仪》、《五礼仪抄》、《续五礼仪》。李晦斋《奉先杂仪》，赵振《退溪先

礼学上的相对微观的问题并无暇顾及细讨，亦缺少日韩此方面的研究介绍，比如具体到朝鲜投壶的问题，便乏人问津；韩国学界对于投壶的研究，也大多集中于艺术与体育的方向来考察微观层面的具体案例，较少全面且综合性的考察。²⁾ 投壶作为一种重要的儒家礼仪，在中国、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亚文化圈都产生过源远流长的影响，其意义非比寻常。本文将投壶为切入点，钩稽中朝相关史料，以朝鲜半岛之投壶简况、同异、特色概作梳理，对投壶在东亚文化中的扩散与变迁，从横向与纵向维度试为探研，不断芹献，以就正于方家。

II. 中国投壶的滥觞与变化

投壶源起于春秋，是由射礼演化而成的一种宴饮时的礼仪、游戏。据胡新生先生研究，射礼最早是带有军事色彩的比赛，是源于先民社会的备战意识，表演色彩是较少的，从西周昭王(前995年—前977年在位)时的令鼎铭文便可看出此时便已有了娱乐场合的射礼，懿王(前899年—前892年在位)时的匡卣铭文有“懿王才射庐，作象舞，匡抚象乐二，王曰休”的字句，可以说射礼作为“军礼”，在此时已削弱了兵戎性质，并逐渐演化成表演娱乐色彩浓厚的“嘉礼”。³⁾ 也就是在这种宴娱性质浓厚的射礼基础上，产生了连射侯(靶)都略去不立而代以壶的投壶之礼。对于射礼为投壶椎轮一事，经学家代有考证，如《礼记·投壶》郑注曰：“投壶，射之细也。”孔颖达正义曰：

生丧礼问答》，郑逮《五先生礼说》，金诚一《丧礼考证》，柳成龙《丧礼考证》……右方所列礼书，既通俗礼也。则公私遵行奉作金科玉条，乃是我东方不刊之典也。此外礼说所漏，未尝知详有几家，随得随录，以便考阅。兼作证辨也。”稽核李氏文，其所见礼书近五十种，未见者随得随录，礼学著作繁盛可窥一斑。参见[朝鲜]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经史篇·家礼辨证说》，首尔：东国文化社，1959年，第1051-1052页。

- 2) 关于朝鲜礼学的现代研究著作不胜枚举。专书如韩国学者卢仁淑：《朱子家礼与韩国之礼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彭林：《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赵旭：《朝鲜王朝礼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等等。论文如[韩]卢仁淑：《朝鲜朝寒冈郑述的礼学和〈五先生礼说分类〉》，《当代韩国》2002年第一期；林乐昌：《张横渠礼学思想的基本特征及其对朝鲜曹南冥学派的影响》，《中国哲学史》2007年第三期；[韩]朴钟天：《朝鲜后期对〈读礼通考〉的接受及其影响》，《国际汉学》2015年第二期，等等。论文极多，不能缕述。但对于朝鲜半岛的投壶问题，现有成果大多为韩国学界所取得，如韩国学者高莲姬《投壶와 投壶格의 이미지와 고찰》从图像史角度考察了李晚秀的投壶著作，梳理了东亚风俗画里的投壶图像。参氏著：《投壶와 投壶格의 이미지와 고찰》，《韓國古典研究》2015年总31卷，第113-137页；还需要提及的是，金光燮《이만수의『投壶集圖』를 통해 본 조선 후기 投壶遊戲 양상》选取朝鲜朝后期一小段史实，以李晚秀《投壶集图》一书为研究目标下功夫的论文。文章按该书目次依序鳞比，强调了18~19世纪朝鲜半岛的诗会雅集中投壶状况，推许了投壶所具有的治心观德、一张一弛，心平体正之能，参氏著：《이만수의『投壶集圖』를 통해 본 조선 후기 投壶遊戲 양상》，《민족문화연구》2010年第53号，第517-545页；金光燮还有《A Study on the Entertaining Aspects of Tuho in the late Joseon Dynasty》(论朝鲜朝晚期投壶的娱乐性)，也是前文的延展性研究，《민족문화논총》2010年 第53卷，第517-545页；再如 김용기(Kim Yong-Gi)的《김두열의 투호아집도(投壶雅集圖) 연구》，以英祖朝学者金斗烈《投壶雅集图》为中心展开研究，载《동양고전연구》2015年总 第60卷，第283-316页；研究李退溪投壶的如李镇洙：《퇴계철학에서 投壶가 갖는 의의》，《한국체육학회지》34 卷1号，1995年，第72-87页；이상현(Lee Sang Hyeon) 与임식(Im Sik) 的《退溪의 健康管理과 投壶運動思想》，《민족문화논총》2018年总 第69卷，第453-481页。总体而言，韩国学界大多集中于一些具体的问题与著作(如研究李退溪的投壶运动，研究李晚秀的《投壶集图》)，从这一角度而言，两国学者都缺乏较为系统全面的梳理和研究。
- 3) 胡新生：《周代的礼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22页。

案郑《目录》云：“名曰《投壶》者，以其记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此于《别录》属《吉礼》，亦实《曲礼》之正篇。”是《投壶》与射为类。此于五礼皆属嘉礼也。或云：“宜属宾礼。”⁴⁾

射礼有大射、燕射、乡射诸名目。郑康成对鲁、薛击鼓之节这段经文的注是“射，谓燕射”，孔颖达正义曰：

以此“射”与“投壶”相对，用半鼓节为投壶，用全鼓节为射礼。又投壶在室在堂，是燕乐之事，故知此射亦谓燕射，非大射及乡射也。⁵⁾

宋人刘敞经过研究，亦认为投壶是为了节制酒筵轻慢之行的措施，这的确是投壶产生的重要推力：

“古者投壶之礼，主人以宾燕而后投壶也。燕者，礼之轻者也，轻则易，易则褻，褻则慢，酒之祸恒由此作，是以君子恶其褻以慢也，为壶矢以节其礼、全其欢也。”⁶⁾

孙希旦《礼记集解》引吕大临、应镛注，⁷⁾解说进一步详尽起来：吕注云由于庭院不广阔不足以张侯置鹄；抑或宾客众多，不足以备弓比耦(耦即结成搭档小组)；应注云或者有些宾客“病于不能射”，故以矢代箭、以壶代侯，以乐嘉宾、观盛德。

至于投壶具体产生的时间虽难细考，但目前已知最早明确出现投壶一名的文献是《左传·昭公十二年》：

晋侯以齐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壶，晋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为诸侯师。”中之，齐侯举矢，曰：“有酒如渑，有肉如陵。寡人中此，与君代兴。”亦中之。⁸⁾

由此大抵能看出投壶至少在公元前六世纪晚期便已行于宴饮。关于投壶的规则，是以席间酒壶为靶，参加者在壶的一定距离处，轮流向壶口(后增加壶耳)投射木制钝箭，依投中箭数或中箭之格局给与算筹，算多者胜、少者罚酒。谈到壶与箭的况貌，正如《礼记·投壶》所述：

“壶颈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径二寸半，容斗五升。壶中实小豆焉，为其矢之跃而出也。矢以柘若棘，长二尺八寸，无去其皮，取其坚而重。投之胜者饮不胜者，以为优劣也。”⁹⁾

4) [汉] 郑玄注，[唐] 孔颖达疏，龚抗云点校：《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65页。

5) 同上书，第1565页。

6) [宋] 刘敞《公是集》卷三十七《投壶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95册720页。

7) [清] 孙希旦著，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卷五十六《投壶》，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83-138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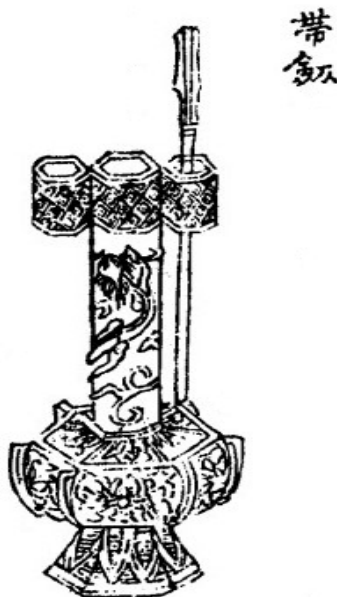
8)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十二年》，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后世箭的形制，其变化相对壶的演变而言较小，基本都是像木杆一样的无镞钝箭。但有人会为了使箭反弹而换用重量更加轻巧的材料，如葛洪《西京杂记》中汉武帝时郭舍人改用更轻巧的竹箭，“激矢令还，一矢百余反”，“如博之擘枲于掌中，为骁杰也”，故名之为“骁”，此殆后世“骁投”之源头。¹⁰⁾

壶的材质，一般是铜、铁、陶瓷之类，总体上唐以前多用铜、陶，唐以后瓷瓶也被施用。但是约在魏晋时期，所采用壶的形制却发生了较大变化，由多用无耳壶转变为多用有耳壶：在西汉以前，以采用无耳壶居多。譬如1974年出土于山东省长岛县南长山岛的战国铜提梁壶身所绘的投壶图刻纹，其描绘的投壶便是无耳修颈大腹壶；¹¹⁾ 河南博物院藏1969年出土自河南省济源市轵城泗涧沟的西汉绿釉细颈无耳陶投壶；¹²⁾ 南阳汉画馆藏1974年出土自南阳市七里园乡沙岗店汉墓的《投壶图》画像石，¹³⁾ 均可佐证此事。¹⁴⁾ 此后随着有耳壶在投壶游戏里的使用，因壶耳的加入而产生的玩法花样也增多起来。晋人虞潭(字思奥，虞翻之孙)撰有《投壶变》，其中便记载了有关掷射壶耳的花式，可惜同大部分投壶专著的命运一样佚失了。清儒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曾辑其部分原文，现摘录如下：

谓之投壶者，取名蒦藪。渐而转易，铸金代焉。逮之于后，人事生矣。壶底去一尺，其下笋以龙元，运之以鰕虾燕尾。矢十二，长二尺八寸。古者投壶，击鼓而节，带剑十二，倚十八，狼壶二十，剑骄七十。三百六十筹得一马，三马成都。¹⁵⁾

马国翰在“带剑十二”(十二指十二算，计分也。)后注曰“入脸颊二带，谓之带剑。”“脸颊”即壶颈，“二带”指壶耳。带剑是投壶的一个花式，譬如北齐的颜之推曾感叹当时投壶名目繁多：“乃有倚竿、带剑、狼壶、豹尾、龙首之名。”¹⁶⁾ 后世的投壶图谱，描绘带剑的图式，多是矢中壶耳，状如佩剑，如下图江堤《投壶仪节》中“带剑”式



江堤《投壶仪节》中“带剑”式

9) [清] 朱彬著，饶钦农点校《礼记训纂》卷四十《投壶》，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854页。

10) [晋] 葛洪著，程毅中点校：《西京杂记》卷五《郭舍人投壶》，《古小说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7页。

11) 郭贤坤《刻纹提梁壶与战国时代的投壶礼》，《体育文史》1995年第3期。

12) 游晓鹏《寻迹中原古竞技之投壶(一)》，《大河报》，2014年7月12日 第A32版。

13) 刘红玉《南阳出土投壶汉画像石赏析》，《中原文物》2002年第5期，第82页。

14) 在此需要辨明的一点是，部分学者认为1974年出土于河北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的犀足蟠螭纹铜筒形器(现藏河北博物院)为投壶，参吕树芝《战国三犀足蟠螭纹铜投壶》《历史教学》1985年第11期；崔乐泉《我国最早的铜投壶》，《体育文史》1999年第4期；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70页。这种看法笔者认为值得商榷，《礼记》所载投壶用壶的形制，当为先秦之形制，而这件犀足蟠螭纹铜筒形器是上下粗细基本一致的直筒形状，与《礼记》所载不符，故此犀足蟠螭纹铜筒形器不当当作投壶，具体用途还应进一步深究。

15) [清]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卷九十九《子编艺术类·投壶变》，《山东文献集成》第一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四十九册 599页。

16) [北齐] 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卷七《杂艺》，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594页。

壶仪节》中对“带剑”式的描绘：



南京博物院藏宋铁投壶¹⁷⁾



首都博物馆藏元八卦纹投壶¹⁸⁾



故宫藏乾隆铜投壶¹⁹⁾

虞潭云“古者投壶，击鼓而节，带剑十二，倚十八，狼壶二十，剑骄七十”，可以看出在他看来“带剑”等玩法、计分渊源久矣，如果马国翰辑佚的虞潭《投壶变》残文没有什么后世的舛入，则可以说明至迟在虞潭所生活的三世纪晚期到四世纪早期，投掷射中壶耳的“带剑”等玩法对时人而言已是司空见惯，有耳壶在投壶游戏里已经是运用比较普遍的壶具。总之，有耳壶的使用，以及种种投壶玩家参与的变革共同推进了投壶的进一步发展，投壶的花式越来越繁杂广漫，趣味性提高，规则逐渐确定和细化下来。

对于投壶的程序，大小戴礼记均作了较为细致的描述。首先是主宾三度相让，以尽谦退之仪：

投壶之礼，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执壶。主人请曰：“某有枉矢哨壶，请以乐宾。”宾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赐矣，又重以乐，敢辞。”主人曰：“枉矢哨壶，不足辞也，敢以请。”宾曰：“某既赐矣，又重以乐，敢固辞。”主人曰：“枉矢哨壶，不足辞也，敢固以请。”宾曰：“某固辞不得命，敢不敬从？”宾再拜受，主人般还，曰：“辟。”主人阼阶上拜送，宾般还，曰：“辟。”已拜，受矢，进即两楹间，退反位，揖宾就筵。

17) 陶敏《南京“古代体育文物展”现“扬州元素”：扬州宋代铁投壶乍看像古代灯具》，《扬州晚报》，2014年8月17日 第A06版。

18) 图片源自首都博物馆官方网站(http://www.capitalmuseum.org.cn/jpdc/content/2011-03/03/content_25920.htm) 使用日期2016年4月20日。

19) 图片源自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http://www.dpm.org.cn/shtml/117/@/114204.html>) 使用日期2016年4月20日。

然后是司射进壶，设中(就是盛算之器)以备插入计数得分的算筹，宣布分组分党，依次而投，败者罚酒，胜者立马形算的诸项规定，并间隔一致地演奏《狸首》雅歌：

司射进度壶，间以二矢半，反位，设中，东面，执八算兴。

请宾曰：“顺投为入。比投不释，胜饮不胜者，正爵既行，请为胜者立马，一马从二马，三马既立，请庆多马。”请主人亦如之。

命弦者曰：“请奏《狸首》，间若一。”大师曰：“诺。”

左右告矢具，请拾投。有入者，则司射坐而释一算焉。宾党于右，主党于左。

接下来就是投完后计算算筹分数，之后行觴庆祝，大抵算是余兴节目：

卒投，司射执算曰：“左右卒投，请数。”二算为纯，一纯以取，一算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贤于某若干纯。”奇则曰奇，钩则曰左右钩。

命酌曰：“请行觴。”酌者曰：“诺。”当饮者皆跪奉觴，曰：“赐灌”；胜者跪曰：“敬养”。

正爵既行，请立马。马各直其算。一马从二马，以庆。庆礼曰：“三马既备，请庆多马。”宾主皆曰：“诺。”正爵既行，请彻马。(自此之后的几句话，是关于壶矢形制、鲁鼓薛节的部分，大小戴于这几句话处文字不同，意思基本一致)²⁰⁾

大小戴所记流程，后世大多因而袭之。如上文所述，有耳壶广泛运用后带来了花式的增多，自然算筹的计算规则要随之更张。又由于去古远矣，难免细节缺失，“然遗风余韵，犹可仿佛”，且“当时世行之旧格，多取奇中”(叶德辉语)，因此司马温公更定《新格》，“有初箭十算……横耳依常算，横壶同倚竿，废其算。耳，倚竿同，带剑同。”²¹⁾因为温公认为，“投壶者不使之过，亦不使之不及，所以为中也；不使之偏颇流散，所以为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²²⁾《新格》之作，也寄托了温公倡导复古、抵制变法的思想倾向。后世《新格》影响士林甚大，流传广远，东邦士子亦甚歆服，朴泰辅《增损投壶仪节》等皆是以此为圭臬厘更适应东邦之仪节，后文还要详细论述。

投壶具有敦睦宾主、教化百姓、修养身心等功能，司马温公总结它有“修身”、“治心”、“存中正”之妙处(《投壶新格》)。在先秦时代既是礼节，又是娱乐，本质上是带有游戏性质的礼仪；魏晋南北朝时礼仪性质降低，变成礼仪性质的游戏。《投壶新格》之作，投壶的礼仪性质再次得到强调，并一直传承至民国时代(孙传芳还进行过投壶活动)。投壶历来君王以之作为教化之组成部分，士大夫为之痴迷，允为不争之事实。

20) 主宾皆参与投壶之主体，司射主持投壶，司正掌正宾主之礼，酌者负责罚负方酒(由胜方子弟充任)，弦者指鼓弦乐工，大师乃乐工之首，主人和乐工等属于主党，宾客和司射等属于宾党。

21) [宋]司马光《传家集》卷七十五《投壶新格》，《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94册681页。

22) [宋]司马光《传家集》卷七十五《投壶新格》，《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94册680页。

Ⅲ. 中国古代投壶的东传

朝鲜半岛与中国早在上古时代就有文化的交流，如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及朝鲜存在的支石墓之相似性，²³⁾ 辽东发掘的琵琶形铜剑在半岛亦有出土。²⁴⁾ 以至后来的箕子东渡、²⁵⁾ 卫满称王、汉设四郡，中原文化持续不断的传入半岛，而且随着中华文化的更新血液，半岛的也随着不断嬗变更迁，加之融入本土色彩，所以半岛的汉风文化呈现出异彩纷呈之局。投壶传入朝鲜，同样经历着保持传统内核与完成朝鲜本土特色化的过程。

关于半岛出现投壶游戏的比较早的记载是《隋书》，这大概是史籍中关于半岛投壶礼戏最早的记载。《隋书》在介绍朝鲜三国之一的百济时云：

有鼓角、箜篌、箏、竽、篪、笛之乐，投壶、围棋、樗蒲、握槊、弄珠之戏。²⁶⁾

《北史·百济传》亦云：

其饮食衣服，与高丽略同……俗重骑射，兼爱坟史，而秀异者颇解属文，能吏事……有鼓角、箜篌、箏、篪、笛之乐，投壶、樗蒲、弄珠、握槊等杂戏。²⁷⁾

《旧唐书·东夷传》亦云：

高句丽……好围棋投壶之戏。²⁸⁾

《隋书》开始编纂于武德五年(622)，中间经历反复，贞观十年(636)方修成奏上。这侧面说明了至少在七世纪的初唐，百济流行投壶之戏的事实已为唐朝史官所知。意即投壶传入百济，至迟应早于武德、贞观年间。可惜目前而言百济考古遗迹、实物中缺乏有关投壶的内容，²⁹⁾ 有待进一步发现。至于新罗，虽

23) 据金贞培研究：“辽东半岛的支石墓主要是典型支石墓，与韩国的支石墓(即北方式支石墓)有相通之处。这是由同一文化生活的居民留下的遗物，可以很自然地把它设定为同一文化圈的、了不起的考古学资料。”参氏著《韩国和辽东半岛的支石墓》，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所编《韩国学论文集》第四辑，1995年，第97页。

24) 可以参考王成生的《东北亚地区短铤曲刃青铜短剑的年代与族属》，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辽宁考古文集》，2003年，第193-212页。

25) 尽管现在存在部分学者带有民族主义倾向导致对箕子东渡完全抹杀，但其反映出的很早之前中韩就有交流、大陆移民很早就迁往半岛并带去中华文化的史实，是很难去否认的。

26) [唐]魏征等《隋书》卷八十一《百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18页。

27) [唐]李延寿《北史》卷九十四《高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119页。

28)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高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320页。

29) 有关百济的考古研究，城址遗迹研究可以参考韩国学者朴淳发：《汉城百济의 誕生》，首尔：西京文化社，2001年。墓葬方面概貌可以参读金基雄：《百濟의 古墳》，東京：學生社，1976年；以及公州大学李南奭教授的《百濟石室墳研究》，首尔：学研文化社，1995年；李南奭：《百濟의 古墳文化》，首尔：西京文化社，2002年；李南奭：《百濟의 墓制研究》，

然缺乏直接的文献记载,有关考古遗迹、实物也未发现相关蛛丝马迹,但其与百济、高句丽相邻,又与中原通贡已久,其时传入投壶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高句丽与中原王朝尽管时有冲突,但其与中原王朝地域毗连,且长期曾为建置属地的背景,使其接受汉文化的传入应该要早于离中原王朝相对较远、在半岛上相对偏南的百济和新罗,且高句丽的建国也要早于百济、新罗。就投壶的考古遗迹而言,时间约在五世纪末六世纪初、属于高句丽晚期壁画墓的集安五盔坟四号墓南壁便有了投壶游戏的图像。³⁰⁾由此可知半岛约在南北朝时期接受了大陆来的投壶运动,这一时期也恰恰是半岛汉风渐沐的年代。³¹⁾

笔者推测,高句丽与百济都是重视骑射的族群,有爱好射箭的传统,³²⁾风俗豪放,喜欢宴饮,这种场合必然也少不了竞技类的娱乐比赛,对投壶的接受是具有心理基础的;此后加之汉文化的传入,投壶又带有儒家礼仪的性质、“华风”的色彩,在朝鲜半岛三国逐渐接受汉文化并将之内化的年代,投壶会益加兴盛,这是可以推想的。综而观之,在中国南北朝时代投壶传入朝鲜半岛且日益兴盛的这一过程中,本就爱好射箭的传统心理,逐渐与追求雅尚“华风”的潮流相结合,对投壶的接受甚至热衷自然是情理之中。

此外还需补充说明的是,如第一部分所揭橥,魏晋南北朝时期带耳投壶成为主流,且玩法花样亦日益增多,所以至此时传入朝鲜半岛的壶,很可能是带有壶耳的壶。后世学者如朝鲜王朝朴泰辅(1654~1689)曾在考察投壶形制时讨论声称壶耳不见经传,又不知起于何时,而沿用已久,无法立即废除,就说明了这一点:

(壶)高及口径,自有古制,可以遵用。但耳不见于经,未知昉于何代,而赘附无益,去之可也。然用之亦已屡千年,今不可卒废,则姑从之。³³⁾

王氏高丽时代礼佛之势甚于尊儒,儒家色彩甚浓的投壶之仪几乎失传,到十二世纪初,投壶作为一种“古礼”早已是“废已久矣”。睿宗国王(1105年—1122年在位)曾推古复礼,下教书决心“绍述先猷,通追三代”、“观光上国,尽捐宿习,欲见天地之全,于变华风;亦推礼义之旧,永言向慕”,³⁴⁾于是重建六斋以学五经(在此之前学官几乎荒废),并大举厘正典礼,其中一项就是试图恢复废置久矣的投壶:

首尔:西京文化社,2002年。陶器方面可以参考韩国学者徐贤珠:《荣山江流域古墳土器研究》,首尔:学研文化社,2007年;以及日本学者土田纯子的博士论文《百济土器编年研究》,韩国忠南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

30) 李殿福:《高句丽古墓壁画反映高句丽社会生活习俗的研究》,《北方文物》2011年第3期,第22-29页。

31) 例如汉式姓名、汉化地名的渐渐普及,与《三国史记·地理志》中载绝大多数非汉式地名在这一时代(尤其是新罗景德王时)统统改成汉化地名(譬如答达乙改名化宁郡、奴斯火改名慈仁县等等)。具体可以参考刘金金:《新罗地方制度模仿唐制初探——以景德王十六年汉化地名为中心》,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32) 现存的高句丽壁画中涉及骑射、射箭的题材不在少数,如以舞踊墓狩猎图、药水里壁画墓的狩猎图以及长川1号墓的狩猎图中均有张弓射箭的画面,关于这方面壁画的图版照片可以参考耿铁华的《高句丽古墓壁画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一书。百济也是“俗重骑射”(《北史·百济传》),应该说二者都是有重视射箭风俗的民族。

33) [朝鲜]朴泰辅《定斋别集》卷二《增损投壶仪节》,《韩国文集丛刊》第168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第224页。

34) [高丽]郑麟趾《高丽史》卷十四《睿宗世家三》,平壤:朝鲜科学院历史所,1957年,第207页。

命内侍良酝令池昌治，讲《礼记》《中庸》《投壶》二篇。谓宝文阁学士等曰：“投壶古礼也，废已久矣。宋帝所赐其器，极为精备，将试之，卿等可纂定投壶仪并图以进。”³⁵⁾

有关睿宗命制投壶仪范的具体内容，汗青阙文。对高丽时代的士大夫来说，仪范的失传和混乱也给他们投壶时带来困难。直至高丽后期的文人崔瀼(1287~1340)，仍在感叹举行投壶的难度，感叹自己虽然通过阅读温公《新格》了解了投壶概貌，却因为一来民间气氛不热，“无师友可以问而质之”；二来“生长海隅，不得与中原士夫相接”，不能亲自“拥矢请益身习之”，平日里投壶一事虽“未尝不日往来于胸中”，可惜“家既无壶，而国中之士又未有畜之者”。所以虽然极其喜好，却无能为力。³⁶⁾ 崔瀼的寂寞也反应了当时投壶在高丽士大夫之间不流行的情况，作为贵族宴饮、文人色彩的闲娱性游戏，它又注定不可能被忙于生存的庶民青睐。直到朝鲜王朝投壶的这种窘况才大有改观。

IV. 投壶在朝鲜的流变与盛行

朝鲜王朝肇建，一改高丽的崇佛政策，施行事大尊明、儒教治国之方针。投壶作为儒家传统礼仪游戏，自然在鼓励之列。也就是在朝鲜王朝时代，投壶才真正地在朝鲜半岛再次勃兴起来。朝鲜王朝的君王往往亲自参与或观看投壶，今将部分朝鲜王朝之实录中的记录略作胪举：

朝鲜朝 《世宗实录》 宣德六年六月十六日戊申条：戊申，御庆会楼，观宗亲投壶，赐物有差。³⁷⁾

朝鲜朝 《世宗实录》 宣德六年六月二十四日丙辰条：传旨书筵宾客：“世子长于深宫，无所见闻，接人则颜色赧然，举止羞涩。自今若宗亲投壶射侯，则令世子入侍，习见接人进退之仪何如？”郑招、尹淮等以为：“上之所为，非礼不动，可令世子入侍观感。”申檣、郑麟趾以为：“世子今方学问，未可习见杂事。”上曰：“投壶，古人所以观心术之邪正者，与焉可也，射侯则不令见之。”³⁸⁾

朝鲜朝 《世宗实录》 宣德七年八月十五日辛丑条：辛丑，御庆会楼下，观让宁大君以下诸宗亲投壶，仍设宴，夜分乃罢。³⁹⁾

朝鲜朝 《世祖实录》 天顺元年二月六日庚子条：御庆会楼下，试武举初重试。命都镇抚及宰枢，射侯投壶。⁴⁰⁾

35) [高丽] 郑麟趾《高丽史》卷十四《睿宗世家三》，平壤：朝鲜科学院历史所，1957年，第208页。

36) [高丽] 崔瀼《拙菴千百》卷之一《春轩壶记》，《韩国文集丛刊》第3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19页。

37) 《李朝世宗实录》卷五十二，世宗十三年、宣德六年六月十六日戊申，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6年，第八册114页。

38) 《李朝世宗实录》卷五十二，世宗十三年、宣德六年六月二十四日丙辰，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6年，第八册117页。

39) 《李朝世宗实录》卷五十七，世宗十四年、宣德七年八月十五日辛丑，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6年，第八册20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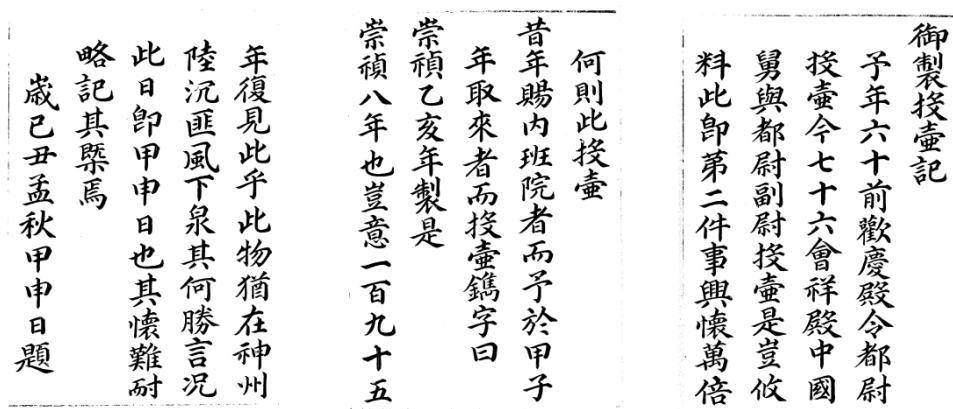
40) 《李朝世祖实录》卷六，世祖三年、天顺元年二月六日庚子，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7年，第十三册125页。

朝鲜朝《世祖实录》天顺元年七月二日癸亥条：癸亥，御庆会楼下设宴，宗亲二品以上、议政府、六曹参判以上、延昌尉安孟聃……等入侍。分左右，或射侯、或投壶。世子及宗宰以次进酒，命击钟聚阙内军士于庆会楼池边赐酒。⁴¹⁾（案：此亦可见朝鲜投壶之流程。）

朝鲜朝《世祖实录》天顺元年十月二十二日壬子条：御庆会楼下观射……命宰枢分左右投壶，较胜负。⁴²⁾

朝鲜朝《世祖实录》天顺二年七月十九日甲辰条：甲辰，御庆会楼下观射，让宁大君禔……等侍，或投壶射的。⁴³⁾

以上仅略举数端，不足尽言。《实录》中所记君王宗亲投壶，俯拾即是。据笔者统计共四十多次举行投壶的记录，相较于明清两代实录中关于没有一处有关皇帝宗室臣僚举行类似宫廷投壶仪式的记载，朝鲜君主不可谓不重视投壶。尽管《明实录》《清实录》缺乏宫廷投壶的记载，但明宣德朝宫廷画手商喜所绘《明宣宗行乐图卷》（现藏故宫博物院）中描绘了明宣宗投壶的景象，清代乾隆铜投壶的原物仍在故宫有所庋藏，这都是投壶活动在紫禁城内存在过的痕迹。不过不如朝鲜宫廷重视这一活动是显而易见的了。



英祖国王《御制投壶记》，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崇禎后己丑(1769) 钞本

朝鲜王朝的君主们不仅重视投壶的娱乐功能，往往也对其教化的效用有所认识。譬如世宗大王因世子（后来的文宗大王）“长于深宫，无所见闻，接人则颜色赧然，举止羞涩”，所以要求自此以后宗亲投壶之时

41) 《李朝世祖实录》卷八，世祖三年、天顺元年七月二日癸亥，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7年，第十三册157页。

42) 《李朝世祖实录》卷九，世祖三年、天顺元年十月二十二日壬子，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7年，第十三册182页。

43) 《李朝世祖实录》卷十三，世祖四年、天顺二年七月十九日甲辰，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7年，第十三册237页。

世子入侍，以便学习“接人进退之仪”，世宗大王认为投壶是“古人所以观心术之邪正者”，其教育之功、鉴人之效不可忽视。⁴⁴⁾ 正祖国王在亲自所作《投壶铭》也讲：

直尔躬，正尔心，发尔矢。虽不中，不怨胜，反诸己。俯身引臂，务胜必得，小人之为。确然不动，毅然不改，君子以之。⁴⁵⁾

不仅君王倡乎此道，士大夫亦多凛遵者，正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君王的亲自关注将投壶在朝鲜推广到了一定的大范围上：上至宗胄，下及士大夫皆趋之。那么投壶对于文人是什么状况呢？几条文人的翰墨书札大致可以见其端倪。

宋时烈《答朴立之长建》云：

昔癸未甲申之间，先令监临莅永同，陪游水石之间，犁然荷忘年之义。或与尹都宪兄弟来拜吾母，及莫维杨，与京里诸生好成道峰之会，展祠投壶，甚相乐也。⁴⁶⁾

宋时烈是海东朱子性理学大儒，时人目之为东邦朱子，尊谓之“宋子”。宋时烈一生以朱子为行为楷范，一举一动皆合乎“礼”，自然对投壶这种礼仪色彩浓厚的游戏陶陶然乐于其中。

又见金鏞《闻诸公雅集莲菴，滞直未赴，走笔奉似云坡俞兄转示枫皋词伯阁下五首》(其一)云：

申时牌插黑衣呼，才罢书筵日已晡。暂卸朝袍成默坐，下番无事独投壶。⁴⁷⁾

南公辙《题弟子院诗后》云：

上五年，余与闵圣能、李元履、韩子定集城北金氏之弟子院为进士业。时或携酒挈投壶，披襟于古松之园，纳凉乎清风之馆，谈调谐谑其间。凡五十日得诗共三十二篇。⁴⁸⁾

由上我们约略看出，投壶一事，朝鲜王朝与中国一样，文人们都喜在宴饮、逸乐、消遣寂寞时光(如“投

44) 《李朝世宗实录》卷五十二，世宗十三年、宣德六年六月二十四日丙辰，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6年，第八册117页。

45) [朝鲜] 正祖《弘斋全书》卷四《春邸录·铭·投壶铭》，《韩国文集丛刊》第262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第63页。

46) [朝鲜] 宋时烈《宋子大全》卷一百十六《书·答朴立之长建》，《韩国文集丛刊》第112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0年，第165页。

47) [朝鲜] 金鏞《潭庭遗藁》卷十二《闻诸公雅集莲菴，滞直未赴，走笔奉似云坡俞兄转示枫皋词伯阁下五首》，《韩国文集丛刊》第289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2年，第567页。

48) [朝鲜] 南公辙《金陵集》卷十三《题跋·题弟子院诗后》，《韩国文集丛刊》第272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第239页。

壶复投壶，寂寞我与吾”⁴⁹⁾的行径)的时候为之。并且，投壶也常常被作为检验、修养身心的一种途径，甚至成为一些学派的修道手段。这一点下文中还要提及。



蕙园申润福(1758~19世纪初)《蕙园风俗图帖》中《林下投壶图》

朝鲜文人们是投壶游戏的忠实拥趸，他们是正统的儒生，深谙儒家六艺。投壶属于射礼之列，除了可以融洽宾主感情，还有“观心术之邪正”、静心专志的作用。汉末王仲宣《投壶赋序》云：“夫注心锐念，自求诸身，投壶是也。”⁵⁰⁾ 朝鲜王朝的文人们也意识到了这点，譬如洪吉周《投壶铭》将投壶器具的品格拟人化来阐释道德品性：壶之虚也，不虚不容；矢之直也，不直不通。壶之圆也，不圆则格；矢之重也，不重则无力。⁵¹⁾

又如郭鍾錫认为投壶可以检验人之潜心静定的品格，他在《答韩希宽》中说：且窃谛夫投壶之席，容体庄直。相见之时，辞气举止都雅，于可以验其内之专静。⁵²⁾

49) [朝鲜] 李荇《容斋先生集》卷五《谪居录·弘治甲子夏四月·谪忠州以后作》，奎章阁藏崇祯七年(1634)甲戌清州菩萨寺刻本，第五册7页a。

50) [魏] 王粲《王粲集》卷二《投壶赋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3页。

51) [朝鲜] 洪吉周：《孰遂念》第八观《投壶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藏徐有榘自然经室钞本第四册，第15页a。之所以称“观”不称“卷”，案洪氏书凡例，“古人书于竹则编之，书于帛则卷之，今人书于纸，联之为册，而犹称以卷……甚无谓也。是书改卷为观，纪后人观阅之次序也。不曰读而曰观者，浅陋之文不成读也。”“观”是洪吉周本人自己创立的书籍分篇计数单位。

崔东翼在《西山先生遗事》中还回忆自己的恩师金兴洛以投壶教育子弟平伏傲气、静心自修：

先生尝草定投壶仪节，具壶与矢，使穉孙招门内诸儿作耦习投，盖欲按伏其不羁之气也。⁵³⁾

关于朝鲜王朝投壶的礼轨程序，因朝鲜“悉遵华制”，故大致与中华无异。⁵⁴⁾道光间金景善(1788~1853)作为燕行使团中书状官身份来华，观摩中土风物，在《留馆别录》中记录并比较了中朝共有之技艺(象棋、投壶等)，提到了两国投壶的相似性：

投壶与射，皆如我法。筹法已见于器用录。⁵⁵⁾

对于具体的流程，正如朝鲜礼学家黄景源《投壶歌》云：

壶深五寸容小豆，柘矢棘矢皆有皮。司射设中执八筹，冠士升阶使者随。鲁令弟子毋背立，薛令弟子亦如之。圆者一击鼙，方者一击鼓。主人请歌狸首诗，朱弦玉徽聊自拊。羽声上夏锦屏云，宫声下杂龟潭雨。角声激越征声变，商声嘹亮三清浦。乐终告奇纯，孰胜孰不胜。饮者执觞请赐灌，珠帘翳翳花光暝。童子莫言左党贤，枉矢哨壶不足称。将入三岛数多马，请速羽人以为证。⁵⁶⁾

这与大小戴二哲所记流程几乎一致，但一项运动、一种仪式在传承与传播中很难不发生偏离与变化。孝宗时文臣、亦是礼学学者朴泰辅，为此参考前贤经疏，结合实际，制《增损投壶仪节》以便士林行用。⁵⁷⁾今按核是书与大小戴所记，比较显著的就是对筹算的改革：第一是降低了对中壶耳的算筹数(分数)，因为朴氏认为壶耳属于偏侧，得分若是和中壶口一样或比壶口高，无疑是对代表“中正”的壶口的蔑视：

52) [朝鲜] 郭鍾錫《倪宇先生文集》卷六十三《书·答韩希宽》，《韩国文集丛刊》第341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8年，第480页。

53) [朝鲜] 崔东翼《晴溪集》卷九《西山先生遗事》，延世大学藏壬戌(1923)崔养燮家刻本，金册42页a。养燮，东翼子也。是书各册以五行命名。

54) 譬如李德懋《礼记臆·投壶》云：“扶五扶七扶九扶注，铺四指曰扶，一指案寸。案指有大小，不知用何指而准。若并铺四指，则食指长指无名指小指壮杀不齐，不合于一指。案寸之义，又人身有大小，指亦随而类焉，亦何以定之耶？然投壶之礼，取其简而质也。”李德懋是讲矢的长度以“扶”为单位。一扶是4寸，扶分三种：五扶、七扶、九扶。这无论在中国或是朝鲜，是一样的。见[朝鲜]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八《礼记臆》，《韩国文集丛刊》第257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第144页。

55) [朝鲜]金景善《燕轺直指》卷六《留馆别录·技艺》，《燕行录全集》第七十二，韩国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年，第371-372页。

56) [朝鲜]黄景源《江汉集》卷一《诗·投壶歌》，《韩国文集丛刊》第224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第14页。

57) 朴泰辅在《增损投壶仪节》中对自己制定此书的目的作了阐释：“古者壶矢之制，揖让之容，今虽阙焉，然其遗风余象，犹可髣髴也。世传投壶格图，皆以奇隽难得者为右，是亦投琼探阄之类尔，非古礼之本意。余今更定新格，增损旧图，以精密者为右，偶中者为下。使夫用机侥幸者，无所措手焉。”见[朝鲜]朴泰辅《定斋别集》卷二《增损投壶仪节》，《韩国文集丛刊》第168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第224页。

投壶之有耳，使人诚意不专，甚非所以纳乎中正之道也。然既不得而去之，则倍筭之法，不可废也。至以耳筭倍口，则是中正者居无用之地，而偏侧者为争利之所，适足诱人以不中不正，矧得谓之用心尤精哉。⁵⁸⁾

再就是降低那些“精巧”的偶然性大的投法之得分，朴氏认为骠投、横壶这类花式偶然性大，属于投机取巧，会“败心术”、“坏威仪”，激发人的侥幸心理，将这上升到了坏礼损仪的高度：

骠箭接取与否，亦是偶然。其将接取之际，颠倒踊跃，苟褻可骇，乃反褒赏。至此抑何意哉。此二者一则足以败心术，一则足以坏威仪。苟不革此，不可以为礼。⁵⁹⁾

所以朴泰辅作出了自身理解基础上的符合礼制的更改。原本司马温公《投壶新格》规定“骠箭十筭，横耳依常筭，横壶同倚竿，废其筭。耳，倚竿同，带剑同。”⁶⁰⁾而朴氏进一步改为“耳一筭，倚竿半之。壶二筭，倚竿半之。有初连中，有终横壶。骠箭废之，带剑依常筭。”⁶¹⁾朴氏颇带道学气地声称这些花样“将以一矢掩累中之得，易启人侥幸之心”，认为这些容易诱发人的侥幸心理，有伤心性天理。这也足窥朝鲜王朝主流意识形态性理学对士人固有思维影响之一斑。

朝鲜朝末期学者、反日义兵运动代表之一的李承熙也研制过投壶的具体仪节，作《投壶仪式》，基本承袭旧法。然与从前相比，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譬如主宾乐工的具体所立的方向细化，“矢，设宾席于堂北，少西南向；主席于堂北，少东南向；对席于宾主席南，稍东稍西相向；司壶，设壶于堂东北上；司矢，设中于壶南，矢于其北；设尊于东夹室北壁下，筐于尊西，爵置于其中，富于筐西；乐正，悬鼓于堂南两楹间两堂相处，设弦于堂南两楹间。”⁶²⁾再如胜党庆爵时以次跪，并亲酌以饮，不使弟子。⁶³⁾这都是李氏为了更加庄重而做的更定。礼仪合为时宜而变，李氏所处时代，日人侵攻，朝纲晦暗，“蛮风”冲击，礼崩乐坏，难免激起李氏以礼教正心救世之思。李氏甚至制定“少年版”的投壶，供书塾中学子使用，一则振奋尚武，二则以礼正心。只不过因学子年少，去掉了庆爵饮觞的流程。⁶⁴⁾

之所以朝鲜士人对投壶进行一定的厘正，正如朴泰辅引《林德涵答南子问书》，是因为古制去今久远，难以尽行。也是为了远邪辟之气、养中正之心：

“古人平居礼数，本自郑重。其行于燕戏之间者，亦周详谨密如此，盖皆出于诚心而非伪貌饰情

58) [朝鲜] 朴泰辅《定斋别集》卷二《增损投壶仪节》，《韩国文集丛刊》第168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第227页。

59) 同上书，第227页。

60) [宋] 司马光《传家集》卷七十五《投壶新格》，《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94册681页。

61) [朝鲜] 朴泰辅《定斋别集》卷二《增损投壶仪节》，《韩国文集丛刊》第168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第227页。

62) [朝鲜] 李承熙《韩溪遗稿》卷六《投壶仪式》，韩国史料丛书第23辑，国史编纂委员会，1982年，第338页。

63) [朝鲜] 李承熙《韩溪遗稿》卷六《投壶仪式》，韩国史料丛书第23辑，国史编纂委员会，1982年，第342页。

64) [朝鲜] 李承熙《韩溪遗稿》卷六《学课规则》，韩国史料丛书第23辑，国史编纂委员会，1982年，第327页。

也。今人既无此根本，一朝因射投之事。欲一一尽绳以古制，则实恐难行。且令抑而行之，亦伪貌饰情而已。善哉言乎！虽然。圣人制礼教人，揖让进退者，岂直修饰威仪以为观美哉。亦将以远其惰慢邪辟之气而养其心于中正也。今人虽不可遽至周旋中礼之域，诚能乐善好古，勉强行之。则一日习礼，必有一日之益，未可以为伪貌饰情而废之也。”⁶⁵⁾



朝鲜朝末期画家金俊根 《箕山风俗图帖》中《投壶图》

提到朝鲜一朝之投壶不得不不说一个代表性人物，就是退溪李滉(1501~1570)，滉字景浩，庆尚道安东人，号退溪、陶翁、清凉山人、真宝人，朝鲜中期硕儒。李退溪发展了朱子学，创退溪学派，是宋时烈之前治性理学最有成就者，至今一千元韩币上仍有其肖像。投壶，与其亲手所立陶山书院，影响可见一斑。退溪酷爱投壶，视之为修炼身心之妙术、体验大道之途径。在陶山书院中，退溪设置了投壶之器具，常常练习以保持身体健康，并示教弟子门生随之修炼。他曾亲自赋诗以志之：

65) [朝鲜] 朴泰辅《定斋别集》卷二《增损投壶仪节》，《韩国文集丛刊》第168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第233页。

礼乐从来和与严，投壶一艺已能兼。主宾有党仪无傲，筭爵非均意各厌。比射男儿因肄习，其争君子可观瞻。心平体正何容饰，一在中间自惊潜。⁶⁶⁾

退溪本人除了强调投壶对于君子陶冶育成之功以外，他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加之在当时及后世的士林中巨大的影响力，带动了一大批追随他的士子对投壶的热情。退溪留下的投壶，甚至在士子瞻仰吊怀时被视若珍宝，如朝鲜王朝后期实学大家星湖李瀾(1681~1763)曾至陶山书院拜谒退庵遗迹，作记曰：

余自清凉转访陶山，申泽卿实与同之。……旋马左趋，始抵陶山。陶山者先生别业，而所常起居地也。……先生手创陶山书堂尚在此，后人因建书院于堂之后，以尊奉之也。余等下马，端恭入外门……先生歿已百四十年之久，而物独蔽芾然，犹存则人之封植嘉树。比于甘棠者不亦宜乎！及观于室中，西北二壁，皆有藏，藏各二层，皆贮遗器。即玗衡具一、案檠投壶各一、花盆台唾器各一、砚匣一、人言砚为人所偷而今不存。……吁先生之一言一动，无不为后之范则，而慕之如祥云瑞日，仰之如泰山北斗。今居处器用，犹有不泯者存。则人孰不爱玩而奇宝之哉！⁶⁷⁾

再如朝鲜后期宿儒赵述道(1729~1803)，其素钦退溪，曾效之立“晚谷精舍”，晚年任陶山书院山长，他曾作《敬次陶山闲居二十韵》之《投壶》：

枉矢哨壶缚法严，吾心正处射仪兼。纯奇有数嘉宾耦，胜负非争酬酌厌。樽俎从容资玩养，衣冠齐整足观瞻。胶庠游艺斯居一，中不中间着意潜。⁶⁸⁾

韩国学者李镇洙认为“投壶的意义在于，它是(朝鲜)王朝用来控制思想的一种手段，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游戏”，⁶⁹⁾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其实更不如说是以投壶为组成部分的儒家礼仪系统成为朝鲜王朝教化民众、巩固统治的驭民之策；李氏亦认为“退溪的审美通过投壶完成了经历了身体和精神的合一”，退溪的投壶之道相当重视精神的专一与虔敬，笔者认为这这也是一个完成虚一而静的过程：“心”若欲明“道”，须做到虚心、专心、静心，这也是一种身心的颐养和升华。

退溪的投壶，不仅仅重视精神，亦关注身体，通过投壶过程中对身体的专心整顿，儒家美德就以这项传统活动为介质传承下来。这恰好与距退溪数百年前的司马温公《投壶新格》中体现出的精神是一样的：使投壶变成“纳民心于中正”的活动，从而治心、修身、为国、观人。⁷⁰⁾退溪对于投壶在乡校书院

66) [朝鲜] 李滉《退溪先生文集》卷三《诗·和中子闲居二十咏·投壶》，《韩国文集丛刊》第29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110页。

67) [朝鲜] 李瀾《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三《记·谒陶山书院记》，《韩国文集丛刊》第199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464页。

68) [朝鲜] 赵述道《晚谷先生文集》卷二《诗·敬次陶山闲居二十韵·投壶》，《韩国文集丛刊》续辑第92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0年，第183页。

69) [韩国] 李镇洙：《퇴계철학에서 投壺가 갖는 의의》，《한국체육학회지》34卷1号，1995年，第72-87页。

70) 何儒育：《论司马光〈投壶新格〉之义理内涵》，《书目季刊》2012年12月，第17-34页。

中之推广流行居功至伟，投壶也变为“礼”的象征之一，这也有助于投壶在儒生中普及开来。由是观之，投壶在朝鲜王朝，既有居于庙堂的君王的推崇，又有李退溪这种一呼则士林景从的儒林巨擘的推动，这使得其逐渐渗透进入朝鲜士大夫的文化生活，成为其文化基因中不可或缺的片段。

朝鲜王朝的投壶，除去作为娱嘉宾、宣教化的嘉礼的一面得到重视外，其习武事、晓兵机的军礼一面也未被遗忘，朝鲜王朝军旅投壶蔚然成风，朝鲜的士大夫乃至军将对投壶这一行为倾注了不少军事教育、激励武风的意念。而这在朝鲜文人的笔下俯拾即是，如朝鲜前期名臣徐居正(1420~1488)《送平安道郑积评事》云：

手挽天潢洗朔漠，天山挂弓传箭息。幕府无事静牙纛，投壶雅歌传觞急。⁷¹⁾

徐居正《送全罗吴节度》：莫说御戎无上策，端知制寇有奇功。投壶歌雅笑谈里，横槊哦诗气概中。⁷²⁾

中宗朝的金安国(1478~1543)《次兵营新阁韵》：百战奇功宁得策，六韬长算自如神。投壶拔石辕门静，森戟凝香燕寝新。⁷³⁾

尤其是在经受过“两乱”之后的朝鲜，经受兵灾的士大夫们更有着切身的体会，一时间欲崇武备之气炽然：于时代的大环境而言，比如孝宗大王时北伐论的盛行和相应朝廷军事改革的推行；具体到个人而言，比如身经“胡乱”和明清嬗代的黄景源，除去纂《明陪臣传》以激扬义烈、欲修《南明书》以昭春秋大义外，作为礼学名宿，他对投壶的态度也值得注意，他认为投壶乃是“将以习军旅之事”的礼仪，此可以供我们了解那个时代士大夫如何看待投壶方面一窥豹斑。再如明宗、宣祖朝的辛应时(1532~1585)《送郑立夫北兵使彦信》：

青海寒通弓满月，白山晴拂剑生花。遥知静养平平地，玉帐投壶听雅歌。⁷⁴⁾

仕历中宗、仁宗、明宗、宣祖四朝的郑士龙(1491~1570)《题曹判书草亭》：云收乱嶂明戈戟，石激清滩响玦环。征虏投壶宜日永，相如授简奈诗慳。⁷⁵⁾

仁祖时僧人六指率众民变，时折冲将军、训练院判官(典练内兵)吴国华领兵平叛，整肃部队，安营投壶，一在迷惑敌人，二在激发战斗之气氛，砥砺战心，壮乎声势：

71) [朝鲜] 徐居正《四佳诗集》卷三十《送全罗吴节度》，己巳(1929)仲春寿昌世家活字本，第9册25页a。

72) 同上书卷四十五。

73) [朝鲜] 金安国《慕斋先生集》卷一《诗·次兵营新阁韵》，《韩国文集丛刊》第20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8年，第20页。

74) [朝鲜] 辛应时《白麓遗稿》卷一《七言律·送郑立夫北兵使彦信》，《韩国文集丛刊》第41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406页。

75) [朝鲜] 郑士龙《湖阴杂稿》卷一《宜春日录·题曹判书草亭》，《韩国文集丛刊》第25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16页。

(王上) 广询捕御之材, 宰臣以公对。上召问曰: “当用几何人而足?” 对曰: “鼠窃狗偷, 不过用三百人。” 翌日, 行阵军客甚肃, 遂进迫贼营, 休甲投壶, 以示安闲。当月色熹微, 缚草为人, 列立若袭击状, 多得贼矢。率勇士踰城, 鼓譟大呼。贼慌恟开门而走, 追击斩三千余级。⁷⁶⁾

再如肃宗朝的金昌协(1651~1708)《辕门》: 辕门北接古匈奴, 书记腰间佩轡轳。兵事即今休草檄, 雅歌终日且投壶。⁷⁷⁾

仕历仁、孝、显三朝的赵綱(1586~1669)《晓角》:

边城画角吹乌乌, 门鹊晨光群吏趋。官事纠纷常拄笏, 边忧蓬勃欲投壶。⁷⁸⁾

仕历纯、宪、哲、高的外戚重臣赵斗淳(1796~1870)《送金尚书学性巡察岭南其二》: 黑头三节世非无, 学识谋谟是谓儒。天上星辰曾曳履, 军中日月且投壶。⁷⁹⁾

活跃于英祖朝的学者权櫓(1713~1770)《敬题从祖公戊申再莅锦营帖》: 河朔征兵留郭相, 剑门持节引严公。投壶决胜檐帷外, 仗钺看耕战鼓中。⁸⁰⁾

由上文可见海东行伍之中, 投壶甚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笔者以为这与朝鲜半岛自古以来兵燹较多有关, 北邻女真之侵犯。女真一直与朝鲜王朝当局有冲突, 最后后金崛起并入侵朝鲜, 史称丙子胡乱, 后果导致世子都得到做人质, 东受日本之倭乱, 士人渐渐有了练习兵技以御强敌的动机, “边忧蓬勃欲投壶”说的就是这样的心情。而且半岛早在三国时代就有尚武之风, 高句丽古墓中大量的角抵、狩猎壁画与出土铜铁刀兵, 以及曾大行于世的崇尚兵事武勇的花郎道⁸¹⁾就是一个显著例子, 这种习俗风气的遗留也为投壶在朝鲜王朝的大流行制造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而以圣贤之道为最终依归的儒教深入风行, 难免用到投壶射礼等仪节的教化功能。于是在内忧外乱背景下, 儒家带有兵事色彩的修养精神之仪节游戏——投壶, 与朝鲜民族传统的尚武精神珠联璧合, 潜在的意识里最终是为了弘勇毅之风以保家国。演习军兵之事, 以待不虞之乱, 投壶正好可以作为普及性的、简便易行的手段帮助确立这种意识, 恰如正祖时代的礼学家黄景源《送吴伯玉瑗留守江华序》所云:

夫所谓投壶之礼, 将以习军旅之事也。故其为礼, 刻虎兕猛兽之形以为中, 棘柘坚理之木以为矢, 鲁薛应鼓之声以为节。及既投也, 取筹为马, 马也者, 军旅之用也。

76) [朝鲜] 李中辙《晓庵文集》卷十《墓志铭·宁国原从功臣折冲将军庆尚左道水军节度使锦川吴公墓碣铭并序》, 韩国国学院藏1937年李德镐家刻本, 第六册48页b。

77) [朝鲜] 金昌协《农巖集》卷二《诗·辕门》, 《韩国文集丛刊》第161册, 首尔: 景仁文化社, 1998年, 第337页。

78) [朝鲜] 赵綱《龙洲先生遗稿》卷三《诗·晓角》, 《韩国文集丛刊》第90册, 首尔: 景仁文化社, 1996年, 第45页。

79) [朝鲜] 赵斗淳《心庵遗稿》卷八《诗·送金尚书学性巡察岭南其二》, 《韩国文集丛刊》第307册, 首尔: 景仁文化社, 2000年, 第198页。

80) [朝鲜] 权櫓《震溟集》卷六《七言律诗·敬题从祖公戊申再莅锦营帖》, 《韩国文集丛刊》续辑第80册, 首尔: 景仁文化社, 2000年, 第526页。

81) 花郎道是新罗时代一种训练年轻人的军事教育合一的组织及精神。

方宾主受矢设中，进两楹之间而投之也。宾党居右、主党居左，可谓有军旅之容也。鲁令弟子击应鼓，薛令弟子击应鼓，凡八筹投矢不释，歌《貍首》而庆多马，可谓有军旅之法也。然则君子习军旅，自投壶始也明矣。⁸²⁾

此外，投壶往往伴着雅歌，雅歌是投壶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环节，投壶是“礼”，雅歌为“乐”，所谓“乐主和同，则远近皆合；礼主恭敬，则贵贱有序”(孔冲远《正义》)，“礼所以经国家，定社稷，利人民；乐所以移风易俗，荡人之邪，存人之正性”(《吕览》高诱注)，缩小到投壶这一具体的仪式上来说，投壶活动中的以矢投壶与雅歌扮演了礼、乐之角色，“乐”为“情之不可变者”，“礼”为“理之不可易者”，“乐统同，礼辨异”(《乐记》)，雅歌投壶是相辅相成的统一在投壶之礼内部的两个环节。

雅歌者歌何？《后汉书·祭遵传》曰“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章怀太子注曰“雅歌谓歌《雅诗》也”，意思是歌咏的是诗经里的大小雅。而关于这一问题的原始文献《礼记·投壶》却是另一番叙述：

(主人奉矢……请主人亦如之。)命弦者曰：“请奏《貍首》，间若一。”大师曰：“诺。”⁸³⁾

孔冲远《正义》以《曾孙之诗》为《貍首》，后世学者大多因之，如朱彬注云：“《貍首》，诗篇名也，今佚，《射义》所云《诗》曰‘曾孙侯氏’是也。”孙希旦集解引述诸家关于“《貍首》与‘曾孙侯氏’关系”的论点，大抵与朱彬相侔。

实际上《礼记·射义》中论及了天子诸侯卿士射箭时奏乐鼓歌的规矩以及歌诗的片段(即朱彬认为的《貍首》)，所以章怀太子注为大小雅基本上可以说是望文生义：

其节：天子以《驺虞》为节；诸侯以《貍首》为节；卿大夫以《采芣》为节；士以《采芣》为节。……故明乎其节之志，以不失其事，则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则无暴乱之祸矣。功成则国安。故曰：射者，所以观盛德也。⁸⁴⁾

故《诗》曰：“曾孙侯氏，四正具举；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处，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则燕则誉。”⁸⁵⁾

先秦古礼中天子诸侯各自的投壶用乐不同(天子《驺虞》、诸侯《貍首》、卿大夫《采芣》)，但后世士林投壶，则皆用《貍首》，如孔氏正义所云“即非诸侯投壶而奏《貍首》者，义取燕饮之仪，犹如乡射奏《驺虞》，不计人之尊卑”。⁸⁶⁾

82) [朝鲜] 黄景源《江汉集》卷七《序·送吴伯玉璠留守江华序》，《韩国文集丛刊》第224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第142页。

83) [清] 朱彬著，饶钦农点校《礼记训纂》卷四十《投壶》，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852页。

84) [清] 朱彬著，饶钦农点校《礼记训纂》卷四十六《射义》，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893页。

85) [清] 朱彬著，饶钦农点校《礼记训纂》卷四十六《射义》，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895页。

86) [汉] 郑玄注，[唐] 孔颖达疏，龚抗云点校《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69页。

郑康成注以《曾孙之诗》为《狸首》，后世学者多有因之，如清人朱彬注云：“《狸首》，诗篇名也，今佚，《射义》所云《诗》曰‘曾孙侯氏’是也。”此为曾孙之诗说；又有原壤所歌说，如姚际恒《仪礼通论》不赞成郑注，认为原壤所歌方是；此外尚有认为原壤所歌与曾孙之诗俱是说，如陈澧集说引吕大临云“原壤所歌”与“曾孙之诗”“疑皆狸首诗也”。之后明人江昉《投壶仪节》中径直将“原壤所歌者”后缀上“曾孙侯氏”诗以增益之，⁸⁷⁾教习子弟演练，而“原壤所歌者”见于《礼记·檀弓下》：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执女手之卷然。”⁸⁸⁾

江氏的创作，与其说是复古，毋宁说是在当时条件下利用能够搜集的材料进行的合理想象。但原壤罹经母丧时所咏者并非《狸首》，而是带有“狸首”一词的悲歌，与宴饮时的投壶所歌明显判然二物。

由上可以观见，之所以后人试图讨出《狸首》的原因，在于其久已失传。王国维《汉以后所传周乐考》考证永嘉之乱后三代之乐基本全部亡佚了，自然《狸首》也不能幸免。⁸⁹⁾这一考证是可资信的。笔者无意过多探讨《狸首》本身究竟为何这一聚讼纷纭的话题，⁹⁰⁾更想要阐述的是朝鲜学者对《狸首》的学术探究与复原尝试，以及这一雅歌活动在朝鲜王朝的投壶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乃至朝鲜雅歌的自身特性。

投壶传到东邦后，雅歌习惯仍旧被遵循，如前文引辛应时“玉帙投壶听雅歌”便是云此，再如丽末三隐之一的牧隐李穡仿范希文《岳阳楼记》而作的《西京风月楼记》中记述平壤风月楼胜景艺事道：

今中原甫定，四方无虞，所谓理世也。……而斯楼也，又据一府之胜。宾客之至，一献百拜。投壶雅歌，风来而体爽，月出而神清。荷香左右，情境悠然，岂不乐哉。⁹¹⁾

尹行恁《题翰苑诗轴后》：

87) 即“狸首之斑然，执女手之卷然。曾孙侯氏，四正具举；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处，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则燕则誉。”见[明]江昉《投壶仪节》，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1-12页。

88) [清]朱彬著，饶钦农点校《礼记训纂》卷四《檀弓下》，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58-159页。

89) 王国维著，黄爱梅点校《观堂集林》卷二《艺林二·汉以后所传周乐考》：“大戴《礼记·投壶》记《雅》二十六篇。八篇可歌：《鹿鸣》、《狸首》、《鹊巢》、《采芣》、《采芣》、《伐檀》、《白驹》、《驺虞》……汉魏时存周乐四篇，《鹿鸣》、《伐檀》、《驺虞》在《投壶》可歌之八篇中，惟《文王》一篇不知得自何所。汉雅乐三源：汉初乐家制氏，传鲁乐；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传秦乐；武帝时，河间献王献赵乐。《投壶》所存十八篇盖鲁乐家之传。……子贡时周乐尚有《风》、《雅》、《颂》、《商》、《齐》诸声；而先秦以后仅存二十六篇，又亡其八篇，且均被以《雅》名；汉魏之际仅存四五篇，后又易其三；迄永嘉之乱，而三代之乐遂全亡矣。”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52-54页。

90) 关于《狸首》本身为何的探讨，可以参考胡宁所撰《原壤所歌：逸诗〈狸首〉考》中对历代学者看法的文献梳理，《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胡氏在结论中认为《礼记·檀弓下》中原壤所歌就是《狸首》中的诗句，很可能是其中一章；“狸首”即鸛形神丹朱；《狸首》的内容与狸姓族源神话有关。对此笔者暂时持保留意见。

91) [朝鲜]李穡《牧隐文藁》卷一《记·西京风月楼记》，《韩国文集丛刊》第5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7页。

余拜翰林。得顺汝、星瑞以为僚。常朝夕于堂后。而汝琳摄起居注，相与从游。每退食，从容投壶咏歌，甚相得也。⁹²⁾

金正喜《与张兵使》：

仰慰边忧之溢目，固一闷也。雅歌投壶，足以了之。⁹³⁾

谈到投壶时奏乐雅歌，必然离不开《狸首》。然而由于《狸首》的失传，所以导致了后人的许多推演和想象，朝鲜文人亦概莫能外。与中国文人相似的是朝鲜也存在不少支持应歌《曾孙之诗》者，如朝鲜仁宗时代的郑齐斗，他在《诗笥录拾遗》中说：“狸首，大射礼周礼乐师，又射仪投壶具有之，新宫狸首，礼经正乐之诗也，而皆逸其篇，惟曰曾孙。(郑氏小字自注曾孙‘狸首头辞’)”⁹⁴⁾再如实学大家李瀲亦持此看法。⁹⁵⁾除了按郑康成注使用《曾孙之诗》外，东邦士林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如影响较大的朴泰辅《增损投壶仪节》中认为先儒虽然将曾孙之诗定为狸首之诗，但“若(蓝田)吕氏所引(原壤所歌)”，“今犹可用”，也不反对对“原壤所歌”的使用。⁹⁶⁾正祖时实学大儒茶山丁若鏞认为古时虽王公之丧，棺槨亦不用文木，《檀弓下》讲夫子亲助沐椁，就原壤的家庭而言，不可能违制挑选文木。况且木工活计也不是学士之所能，所以“狸首二句，正是狸首之本文。原壤旧尝肆业，至是歌之也”。⁹⁷⁾

又有全加以批驳者，如朝鲜朝后期经学家成海应认为诸说皆有问题，一方面他批判了郑注曾孙之诗说：“盖郑志则射义载曾孙侯氏诗八句，遂谓狸首，然篇中求射不朝之义而不得也，岂因周苾弘依物怪欲致诸侯，设射不来之事而依附为说欤？”(《狸首说》)且认为如果曾孙侯氏是《狸首》本文，岂有“孔子时见逸，而后来方出”(《逸诗解》)的道理，大概是后人妄作；另一方面又认为原壤所歌“语既褻渎”不太可能出现于庄重的公卿士大夫聚会场合，他推断“原壤所歌者”不过是首句中偶然有“狸首”二字，且“语既褻渎”，岂有可能在“公卿大夫济济之际”，“乃可以是为节”(《狸首说》)，而且成氏认为“原壤所歌者”也没有什么射箭的意味。成氏尤其不同意刘敞《七经小传》中把《鹊巢》当作《狸首》

92) [朝鲜] 尹行恁《硕斋稿》卷十五《题跋·题翰苑诗轴后》，《韩国文集丛刊》第287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2年，第277页。

93) [朝鲜] 金正喜《阮堂先生全集》卷三《尺牍·与张兵使寅植》，《韩国文集丛刊》第301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0年，第81页。

94) [朝鲜] 郑齐斗《霞谷集》卷十六《诗笥录拾遗》，《韩国文集丛刊》第160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430页。

95) 李星湖在《上李畏庵书》中说：“又射义以狸首为节，其诗曰‘曾孙侯氏，四正其体。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处，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则燕则誉。狸首亦类耳，初非无辞者，其他又何以异是哉。盖有诗则有乐，依永和声，宜无古今之不同。然今其诗尚在，乐则无征何哉。东京之末，礼乐萧然。曹操平刘表，得汉雅乐郎杜夔。夔老久矣，不肄习。所得于三百篇者，惟鹿鸣鸛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余声不传。”与观堂相类，李氏亦对周乐流传做了一定的考察。见[朝鲜] 李瀲《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九《书·上李畏庵书》，《韩国文集丛刊》第198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221页。

96) [朝鲜] 朴泰辅《定斋别集》卷二《增损投壶仪节》，《韩国文集丛刊》第168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第224页。

97) [朝鲜] 丁若鏞《与犹堂全书·经集》卷二十《诗经讲义补遗·逸诗》，《韩国文集丛刊》第282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第480页。

的意见(这一派认为“篆文里狸似鹄,首似巢,所以《狸首》即《鹄巢》”),认为其“尤涉强解”(《狸首说》)。总体而言成氏也未提出清晰具体的他对《狸首》究竟是什么的看法,其考证以批驳旧说为主。

除去学术层面对于《狸首》雅歌的争论暂且不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其实朝鲜王朝的投壶雅歌在世宗大王创立训民正音(即谚文,朝鲜语字母)后,虽然歌的是雅歌,但内容上已经发生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变化,不再仅仅是汉文化的雅诗,带有本地化特色的歌曲也走上舞台。⁹⁸⁾譬如李晚秀(1752~1820)⁹⁹⁾辑《投壶雅歌谱》,便是这类雅歌,见下图。



《投壶雅歌谱》, 东洋文库藏嘉庆间钞本(写年未明), 单册不分卷, 全书共十三叶, 每半叶八行, 行二十字, 小字双行。版框高 24.6 公分, 宽 16.2公分, 左右双栏, 青丝栏, 无鱼尾。钤“李公翼印”, “所安堂”, “东老”, “延安李公翼东老”, “读书室主人”, “在山楼搜书之一”印, 钤K. Mayema藏书记一。

朝鲜王朝后期出现了士大夫投壶时属入本地特色歌曲作为雅歌的现象,《投壶雅歌谱》为这一现象作了证明,该书所记载大体流程如下:

选日,分耦,二童妓跪告曰:“请乐宾。”设壶、矢,群妓分立壶侧,先唱:“园林穷盛事,中古乐清

98) 时调是半岛所特有的使用古朝鲜语创作的古体诗歌,多用朝鲜语语法以及谚文字母书写。相较于汉诗这种东亚儒家文化圈里通用的文学体裁,时调具有鲜明的朝鲜民族性。

99) 李晚秀(1752~1820),本贯延安李氏(郡望黄海道延安郡),字成仲,号履翁、履园。父福源,左议政。正祖七年(1783)荫补入仕,曾任直阁修撰、校理、右谕善、内阁提学、广州府留守等职。有文采,好藏书。

时。”两耦受讫，二童妓跪告曰：“礼毕。”群妓分立壶侧，后唱：“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既计划，童妓跪告曰：“左胜则左贤，右胜则右贤。左同画则左右均。胜耦群妓唱《阿弄曲》，不胜耦群妓则画圈眉间，联袂舞以即之。”

歌《阿弄曲》曰：

月阿高高的上来些(월아고고적상래사)

远远的照着时阿(원원적조작시아)

渔几鱼堪钓喇(어기어감조리)

阿弄多弄日日尼(아롱다롱일일니)

汉文写出来的，是用汉字表记朝鲜语记录的读音与大意，括号内的是每个字的汉字音，而唱出来的是以朝鲜民族语言所歌，充满朝鲜本土化的味道：

달아 노피곰 도드샤

멀니곰 비쭈곰시라

어기 어감조리

아롱다롱 일일니.¹⁰⁰⁾

《阿弄曲》原本就是朝鲜半岛古代所流传的歌谣，¹⁰¹⁾李晚秀挑选出此曲作为投壶活动中“胜耦”(获胜一方)所唱之曲目并加以“谚文”注解，也能看出此时的朝鲜士大夫投壶本土化已经到了一定的深度。当然我们需要体认到，在军旅战火正疾之时，可能就并无召群妓分耦歌舞的雅兴了，这只是一种情况。但也必须知道，朝鲜王朝的投壶，雅歌时确实已有使用带有本地化特色的歌曲或时调的现象了。

V. 余 论

中华礼教文明的传入，给半岛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完成了其由夷入夏的进程。但礼在朝鲜是经历了朝鲜化的过程的。这一方面是因地制宜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与斯时空背景息息相关。明朝几乎与朝鲜王朝同时代诞生(前后相差不到三十年)，且朝鲜朝甫开国便“诚修职贡”，因此大力“向慕华风”，振兴礼教，

100) 是书中“算”改为“画”，盖正祖国王讳祿，算、祿、筭字皆须避讳。但在正祖之前，“算”字尚不避讳，如上文中所揭朴泰辅《增损投壶仪节》中就没有避讳“算”字。

101) 本文并非从朝鲜本土歌谣研究角度来切入，此处举出《投壶雅歌谱》的例子，是为了证明朝鲜王朝中后期出现了将朝鲜本土歌谣融入雅歌的现象。为免赘述偏题，关于《阿弄曲》的相关叙述，可以参考韩国学者沈载完的《〈投壶雅歌谱〉研究》，载《青丘大学论文集》第七集，大邱：青丘大学，1964年。

并通过国家层面的礼法兼施的方式推行。礼治是朝鲜王朝“统御国家”的重要手段，具有嘉礼和军礼双重内涵的投壶仪式，在朝鲜王朝时代能得以普及、大行于世，源于礼治向社会各层面的扩散，扩散到士大夫的交游与自修、国家兵戎方面的军游以壮威。“礼所以经国家，定社稷，利人民；乐所以移风易俗，荡人之邪，存人之正性”（《吕览》高诱注），尤其在明清易代之后，东国自认“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文公语），正统在我，斥清夷狄，尊周思明的小中华意识日渐增重。孙卫国先生认为，朝鲜虽自认为夷（相对中原），但其自认为是“华化”的“夷”，而且在朝鲜看来，在中华世界体系中，唯有朝鲜民族实现了“由夷到华”的转变。¹⁰²⁾于斯之世，大张礼义，遵古复礼、重视礼治是时代的需求，也是朝鲜王朝用来笼络拥有思明情结的士人阶层的积极手段，更是王朝为巩固自己统治合法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举措。朝鲜朝以儒教立国，礼为系国纲维，一旦违背，其国家就会发生危机，所以综观朝鲜一朝，一次次的礼讼、换局等乱象，肇起几乎都是以悖礼为由。所以重视礼、举办礼成了上至朝廷士大夫下至庶民的要务。正如茶山丁若镛云“礼不可不恭，义不可不洁。礼义两全，雍容中道，斯之谓君子也”。¹⁰³⁾在这一大时代下，投壶作为一种最具儒家教化色彩的游戏与礼仪，其复兴（相对于高丽时代的佛释盖过儒礼）和朝鲜化是大势所趋。

司马温公《投壶新格·序》提出，投壶可“合朋友之和，饰宾主之欢”，半岛自古属东亚儒家文化圈，自然亦有流风，正如王氏高丽时代的文人崔瀞曾云“投壶之礼，君子所以节宾主之乐而作之者”，¹⁰⁴⁾并强调遗憾自己生在偏远的海隅，不能从中原士大夫学到正宗的投壶仪节而遗憾。其实这说明着朝鲜半岛文人们有着不能完全效仿中原王朝“正宗”的遗恨，更多是对所谓“先进文明”的向往与渴望“文明之邦”认同的心理。

今日之朝鲜半岛，对于投壶一系列儒家传统仪节相当重视，普及度也相对较高。一系列的申遗事件（比如江陵端午祭）藉由媒体多次传播，部分中国民众建构出“韩国伪造侵占中华文化”的误会性认知（这可以通过中国一些网络论坛的发言、以及关于这方面的部分自媒体煽动式消息的传播看出），这一方面令中韩两国民众间加强了疏离感和不了解，另一方面也警示中韩礼学研究者应当增进对东亚自身传统礼仪文化的探索与传承（甚至可以鼓励合作探讨）。研究东亚儒家文化圈中的投壶，乃至礼仪、文教诸方面，不仅仅是兴膳夫先生所云的以“异域之眼”看中国、研究中国文化，也是为中韩乃至整个东亚儒家文化圈，在当今波谲云诡的世界态势下，能愈加体认自身独特及区域共有的价值，提供一点理论与精神上的赞襄。

102) 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7页。

103) [朝鲜] 丁若镛《与犹堂全书·政法集》卷十八《牧民心书·奉公六条·礼际》，《韩国文集丛刊》第285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第348页。

104) [高丽] 崔瀞《拙菴千百》卷之一《春轩壶记》，《韩国文集丛刊》第3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19页。

〈参考文献〉

(按文中参考先后顺序排列)

- [朝鲜] 柳台佐 《鹤栖先生文集》，韩国国学振兴院藏岭南士林文集本。
- [朝鲜] 李圭景 《五洲衍文长笺散稿》，汉城东国文化社，1959年。
-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昭公十二年》，中华书局，1990年。
- [汉] 郑玄注，[唐] 孔颖达疏，龚抗云校点 《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 [宋] 刘敞 《公是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 [清] 孙希旦著，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
- [清] 朱彬著，饶钦农点校 《礼记训纂》，中华书局，1996年。
- [晋] 葛洪著，程毅中点校 《西京杂记》，古小说丛刊本，中华书局，1985年。
- [清] 马国翰 《玉函山房辑佚书》，《山东文献集成》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
- [北齐] 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 《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6年。
- [明] 江昉 《投壶仪节》，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
- [宋] 司马光 《传家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 [唐] 魏征等 《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
- [唐] 李延寿 《北史》，中华书局，1973年。
- [后晋] 刘昫等 《旧唐书》，中华书局，1973年。
- [朝鲜] 朴泰辅 《定斋别集》，韩国文集丛刊第168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
- [高丽] 郑麟趾 《高丽史》，朝鲜科学院历史所，1957年。
- 《李朝世宗实录》，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6年。
- 《李朝世祖实录》，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7年。
- [朝鲜] 宋时烈 《宋子大全》，韩国文集丛刊第112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0年。
- [朝鲜] 金鑣 《薄庭遗藁》，韩国文集丛刊第289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2年。
- [朝鲜] 南公辙 《金陵集》，韩国文集丛刊第272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
- [朝鲜] 李荇 《容斋先生集》，奎章阁藏崇祯七年(1634)甲戌清州菩萨寺刻本。
- [魏] 王粲 《王粲集》，中华书局，1980年。
- [朝鲜] 郭鍾錫 《俛宇先生文集》，韩国文集丛刊第341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8年。
- [朝鲜] 正祖 《弘斋全书》，韩国文集丛刊第262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
- [朝鲜] 洪吉周 《孰遂念》，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藏徐有榘自然经室钞本。
- [朝鲜] 崔东翼 《晴溪集》，延世大学藏壬戌(1923)崔养燮家刻本。
- [朝鲜] 李德懋 《青庄馆全书》，韩国文集丛刊第257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
- [朝鲜] 金景善 《燕轅直指》，《燕行录全集》第七十二，韩国东国大学出版社，2001年。

- [朝鮮] 李承熙 《韩溪遗稿》，韩国史料丛书第23辑，国史编纂委员会，1982年。
- [明] 江堤 《投壶仪节》，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
- 王国维着，黄爱梅点校 《观堂集林》，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
- [朝鮮] 李穡 《牧隐文藁》，韩国文集丛刊第5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
- [朝鮮] 尹行恁 《硕斋稿》，韩国文集丛刊第287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2年。
- [朝鮮] 金正喜 《阮堂先生全集》，韩国文集丛刊第301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0年。
- [朝鮮] 郑齐斗 《霞谷集》，韩国文集丛刊第160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
- [朝鮮] 朴泰辅 《定斋别集》，韩国文集丛刊第168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
- [朝鮮] 丁若鏞 《与犹堂全书·经集》，韩国文集丛刊第282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
- [朝鮮] 成海应 《研经斋全集》，韩国文集丛刊第273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
- [韩] 南丰铉 《吏读研究》序，首尔太学社，2000年。
- [南朝宋] 范晔 《后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
- [朝鮮] 徐居正 《四佳诗集》，己巳(1929)仲春寿昌世家活字本。
- [朝鮮] 金安国 《慕斋先生集》，韩国文集丛刊第20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8年。
- [朝鮮] 辛应时 《白麓遗稿》，韩国文集丛刊第41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
- [朝鮮] 郑士龙 《湖阴杂稿》，韩国文集丛刊第25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
- [朝鮮] 李中辙 《晓庵文集》，韩国国学振兴院藏1937年李德鎬家刻本。
- [朝鮮] 金昌协 《农巖集》，韩国文集丛刊第161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8年。
- [朝鮮] 赵綱 《龙洲先生遗稿》，韩国文集丛刊第90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
- [朝鮮] 赵斗淳 《心庵遗稿》，韩国文集丛刊第307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0年。
- [朝鮮] 权撻 《震溟集》，韩国文集丛刊续辑第80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0年。
- [朝鮮] 朴永元 《梧墅集》，韩国文集丛刊第302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0年。
- [朝鮮] 黄景源 《江汉集》，韩国文集丛刊第224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
- [朝鮮] 李滉 《退溪文集》，韩国文集丛刊第29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
- [朝鮮] 李瀾 《星湖先生全集》，韩国文集丛刊第199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
- [朝鮮] 赵述道 《晚谷先生文集》，韩国文集丛刊续辑第92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0年。
- [高丽] 崔瀞 《拙藁千百》，韩国文集丛刊第3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

* 이 논문은 2019년 5월 22일에 투고되어,
 2019년 6월 17일까지 편집위원회에서 심사위원을 선정하고,
 2019년 7월 22일까지 심사위원이 심사하고,
 2019년 7월 24일에 편집위원회에서 게재가 결정되었음.

Abstract**The Eastern Spread of Pitch-pot in Ancient China and
Its Evolution on Korean Peninsula**

Xu, Cheng*

Pitch-pot(Chinese : Touhu ; Korean : Tuhu) is a classic ritual in east Asian cultural circles, which has a strong entertaining and educational aspect. From the pre-Qin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although the details of the game have changed and lost, but the general content of the inheritance to the present day. Pitch-pot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Korean peninsula during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in China, when it was in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Goguryeo, Baekje and Silla were all keen on this game. Later in the Goryeo dynasty, this kind of game was gradually rare. It was time for the Joseon dynasty, which was founded on neo-Confucianism and Confucian etiquette. In the Joseon dynasty, which was founded by the neo-Confucianism and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Confucian etiquette, the way of pitch-pot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that of the previous dynasties. The game was revived by this opportunity, and a localized change took place. While absorbing the essence of pitch-pot in Central Plains Dynasty, Korean pitch-pot also adapted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produce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Pitch-pot, Korean peninsula,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evolution

* Master's Degree Candidate, Shandong University

